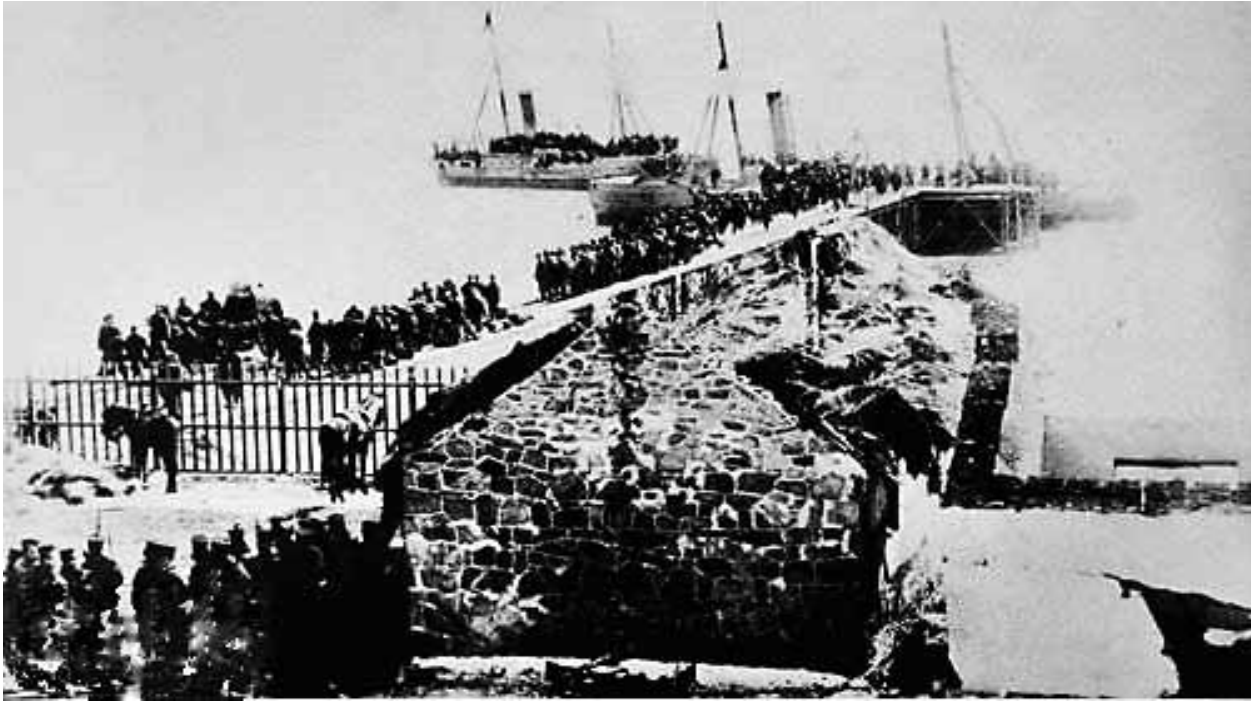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舒健：

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清朝安全战略的失败



1895年,甲午战争结束后,日军在威海遣返被俘清军。(资料图片)

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清王朝安全战略的失败

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调整、大洗牌的时代。西方列强以工业文明为核心，依靠近代化的军事力量，掀起掠夺瓜分世界的狂潮。面对这样复杂的战略环境，如何维护并发展自身的利益，是对清王朝战略能力的巨大考验。

但是，清王朝驾驭复杂环境的战略能力极为薄弱。

首先，在长期专制思想禁锢下，当时中国人的活跃思想被牢牢桎梏、扼杀，每一名社会成员都如同戴着沉重思想镣铐的囚徒，已经完全缺乏时代迫切需要的战略创新能力。

其次，清王朝长期闭关锁国昧于历史浩浩潮流，很晚才

认识到外来威胁是来自海上，很晚才认识到海上威胁绝非海盗行为，而是对整个王朝和制度的挑战。

第三，当此转型关键时期，最需要一个雄才大略、胸怀天下的领袖及其团队的筹划和决断时，运转200多年的大清王朝却正走向没落，权力核心昏庸无能，缺少必需的战略统筹能力。

第四，政治体制僵化落后，官场上下人人各怀鬼胎、尔虞我诈，早已失去战略执行能力。正如曾出使中国的日本政治家副岛种臣所谓：“中国往往有可行之法，而绝无行法之人；有绝妙之言，而无践言之事。”

因此，虽然清王朝对于自身生存发展重大问题上有一定战略思路，但对于“如何保全和局？如何徐图自强？”等核心问题，始终缺乏统一认识，没有总体设计，从而极大影响了清王朝的军队建设、战争准备、外交战略等诸多方面的认识和行动。

与日本相比，清王朝完全没有应付日本进攻的国防战略，更没有制定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，在大战略上目标模糊、摇摆不定。

尽管与清王朝面对同样的局势，日本却采取了不同的战略，那就是“武力崛起”——与其如中国般沦为被侵略对象，

不如加紧富国强兵，成为列强同伙。虽然日本武力扩张的道路不可取，但其目标明确、步骤清晰、步伐坚定的大战略运筹，既让后人高度警惕，也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。

当今时代，全球各种力量相互影响日益紧密，世界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日趋明显，快速崛起的中国将与周边国家处于战略摩擦的高发期。

构建一个顺应历史潮流、拥有全球视野以及目标清晰、系统完整、一以贯之的大战略，是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，在国际斗争中积极主动、进退有据和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。



19世纪后期的清军虽然装备了部分西洋先进武器，但从组织形态而言仍是一支旧式军队。(资料图片)

大战略 迫切需要强大的军队

甲午惨败对中国的震撼，超过近代以来任何一场对外战争的失败。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，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，都产生过提前醒悟的先觉者，但大多数人依然在昏昏沉睡，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跟进。当连一个小小的日本都逼得中国割地赔款之际，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顿时弥漫整个华夏大地。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因此开始！甲午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灾难，但是它具有积极意义：促使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，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！

何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？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百般屈辱，复兴之意于“国”，实为复兴其繁荣、先进与胸怀；于“民”，实为复兴其自尊、自信与自强；于“世界”，实为复兴其贡献、楷模，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。

但是，一些别有用心国家却刻意歪曲，认为中国是试图复兴历史上的武功、版图抑或“不可一世”，并炮制出内容更丰富的“中国威胁论”。

这与120年前何等相似！

19世纪80年代，维新元老山县有朋上奏明治天皇，认为欧洲各国距日本较远，痛痒之处并不急迫，近邻清帝国的威胁才是具体的。针对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加强军备的努力，山县有朋编造出中国将在数年后“称霸于世界”的神话。很快，在其他军国主义分子鼓噪声中，日本掀起“清国威胁论”热潮，并以中国为假想敌大肆扩军备战。

正是打着“消除清国威胁”、“文明对野蛮的战争”的幌子，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。

透过历史我们早已明白，某些国家渲染所谓“中国威胁论”，不过是为其扩军备战求得借口和理由，不过是为其联合遏制中国寻找依据。其最终目的，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把生存和发展的希望交给他们掌握，甚至在中国大地再次上演“甲午悲剧”。

近代以来，因为没有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军队，中国人民受尽苦难；正是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，中华民族才赢得独立与解放；正是因为有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的保卫，中国人民才拥有一个甲子的和平与安宁。

“强国梦”、“强军梦”不可能在“中国威胁论”中却步。

“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力量保障！”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从惨痛教训中得出的结论，是人民军队必须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！（据《参考消息》）

缠足 曾被视为地位的一种象征

缠足是中国古代一种封建风俗，又称莲花足，是指在女性幼儿时期用布缠紧其双脚，使足骨边变形足形尖小。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缠足始于宋代，在过去，它曾被视为美丽和地位的一种象征。20世纪初期，缠足逐渐不再受到追捧，并于1911年被正式废止。

然而，在一些农村偏远地区，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了1939年。近日，英国《每日邮报》刊登了摄影师Jo Farell的一组照片，这位居住在香港多年的英国摄影师，为了见证并记录下这一古老的社会风俗，在2005年开始走访内地寻找被遗忘的缠足妇女，最终在山东一偏远村落找到了50多位这样的妇女。她们被认为是中国现存的最后一批缠足女人。

这些妇女现在大多数都已经



摄影师Jo Farell和她拍摄的缠足照片。

是八十到九十的高龄，她们都是农民出身。在偏远的农村地区，一些人将缠足视为社会地位的象征，因为富有阶层的女子通常不需要自己亲自劳作，这些女子很多都是缠足。（据《参考消息》）

“剽窃” 唐代才出现这个词

近期，两则与剽窃有关的事件，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。一则是，76岁的“言情剧教母”琼瑶，指责于正新剧《宫锁连城》剽窃其旧作《梅花烙》。另一则是，经典歌曲《小芳》的词曲作者以及原唱李春波斥方大同剽窃其作品《小芳》，并给版权总局写公开信，要求维权。剽窃是不光彩的，剽窃也是可恨的。其实，剽窃之风不只是当今社会才有，我国古时早就有之。

我国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剽窃现象。到了汉代，剽窃现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因为有了美文，便可入仕为官。于是，在利益的驱动下，“诸生竞利，作者鼎沸。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；下则连偶

俗语，有类俳优；或窃成文，虚冒名氏”。

“剽窃”一词正式出现是在唐代。“其浑而类者少，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。凡孟、管、策、数家，皆见剽窃。”《大唐新语》记载了一则有趣的剽窃案。唐郎中李播在蕲州做官时，有个举子李生投来自称自己所作的诗文让其点评，李播一看，竟是他当年应试的作品。经再三盘问才知道，原来这是李生在20年前从书肆花钱买来的。

由此可见，剽窃这只可耻的怪兽历史是悠久的。而此风严重地侵犯了作者的权益，无论哪朝哪代，剽窃都是不得人心的。（据《青岛日报》）

耳环

最早是古代男人用来防妻子出轨的

女人佩戴的耳环最初叫“瑱”，东汉刘熙《释名》说，穿耳施珠曰“瑱”。兴于少数民族，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。

史料记载，当初，妇人大多不守妇道，有时竟趁着丈夫熟睡逃出去和情人幽会。做丈夫的便在她的耳根穿凿一个洞，扣上两个金属圆环。这样，女人稍微一动，耳环发出声音，只得打消幽会的念头。

另一种说法是，起初女子没有贞操观念，只要有陌生男人路过，女人便主动搭讪，请起留宿。男人离开时按惯例应送一只耳环给女子，作为留念和酬谢。女人耳朵上耳环越多，越是显出女人的魅力。



2013年陕西出土的纯金镂空凤凰牡丹葫芦耳环(资料图)。

后来，经过时代的变迁，耳环成了女人喜欢的饰品。《陌上桑》里，男人为之倾倒的罗敷是“耳中明珠”；《孔雀东南飞》的刘兰芝是“耳著明月珰”。罗隐在《杂咏》诗所写的游春女子是“金环耳际摇”。（据《羊城晚报》）

帽子戏法 最早出现在板球比赛中

帽子戏法（英文为 hat-trick），也就是在比赛中“连中三元”。

帽子戏法源于刘易斯·卡罗尔的童话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。书中说到一位制帽匠能够出神入化地用帽子变戏法。后来，英国板球协会借用其意，给连续三次击中门柱或横木、使对方3人出局的每个投手奖帽子一顶，以显示其出神入化的投球技巧，这便是板球的帽子戏法。

1858年这个说法首次使用，用来描述英国著名板球手HH·斯蒂芬森连续3次击中门柱得分，赛后为他举办的庆功会上，他得到一顶帽子作为欢庆的礼物。

板球和美国的棒球相似，都要求投手手投掷的速度越快越好，对方击球越远越好。自有板球

以来，凡进板球场观赛的球迷都严格遵守着一条规矩：一迈进球场大门便须脱帽，这意味着对球场上所有球员、裁判和观众的尊重。因此，帽子就代表了尊重。

一般说来，如果一名投手连续投出3个好球而将对方3名球员淘汰出局，是件相当神奇的事。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，裁判便授予那个投手一顶帽子，作为一种至上的荣誉象征。

简言之，帽子戏法的本意就是板球手连续用3个球得分而获得一顶帽子鼓励。

20世纪，帽子戏法很快被引用到其他体育比赛中，如曲棍球、棒球和足球等，指参赛者在同一场比赛中独中三元、连续三次得分的佳绩。

（据《广州日报》）

“炸酱” 最早由努尔哈赤创导

据介绍，炸酱面也不属山西菜肴，而是从前去京都做官的山西籍人退休后从京都（北京）带回的。

追溯溯源，炸酱最早由努尔哈赤大力创导，要以酱代菜，以强化军队的给养，增强士兵体质。清军入关后，这种饮食文化也被带入官中。宫廷里每席饭桌上都有生菜蘸酱，卷起来吃。

炸酱制法看似简单，却很考工艺：用黄酱及肥瘦猪肉各半，放

入葱姜末和蒜茸末，以小火在热油中熬炸半小时以上，就成浓稠油亮的炸酱。

大酱进宫后，酱料制作工艺也越见精致。春夏秋冬四季分别吃不同酱：春天是炒黄瓜酱，夏天是炒豌豆酱，秋天为炒胡萝卜酱，冬天是炒萝卜酱，被称为“宫廷四大酱”。作为皇城根下的老百姓，自然也纷纷自制酱料，各出奇招，倒也有点海纳百川的海派之势。（据《食品与生活》）

鸦片战争后，当清政府真正感到西方文明优越性和国家安全严峻性后，开始了以军事近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。不幸的是，变革主张从未被提升至王朝大战略层面予以重视。所谓“洋务”，在宫廷满汉全席上还算不上“主菜”。

因此，甲午战争前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，几乎是军事变革单骑独进。

而在军事变革领域，也不过是围绕着军事装备和技术打圈圈——铁甲舰是一座守卫要塞的移动炮台，海军不过是陆军的海岸警戒队……既没有充分利用海军的主动性、机动性、进攻性，在战争中夺取制海权，也没有考虑海军舰队与国际战略之间的协同、海军建设与本土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等战略问题。

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落后，不是将士在战场上拼命作战和流血牺牲能够弥补的，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少数顽固派的破坏。

事实上，落后保守的政治体制、经济体制和文化心理，是阻碍中国军事变革强大的社会基础。一些所谓的反动派，不过是这一社会基础的产物和代表。如果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，顽固派不可能发挥强大的破坏作用。

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，中国“将二千年前尚处于未开蒙昧时代之古圣人语录，定为管束人间言行之万世不易之规则”。

山

的枪弹物资留给日军。缴获的粮草如雪中送炭，成为日军的强心剂。其中仅军粮一项，足够进攻平壤的日军14000人一个多月所需。

旅顺号称“远东第一要塞”，令日军望而生畏。日军进攻其中的和尚岛炮台时，有的士兵将行李托付给战友作为遗物，有的将烟卷分得一支不剩，也不带午饭和干粮，不望生还。

然而，日军花费近8个小时，肆意潜行攻进炮台时，清军早已踪迹全无。日军指挥官叹息说：若此炮台为我军把守，一个中队可阻挡百万之敌。

甲午一战，清兵中不乏英勇将士，但更多是“养兵千日，用时一逃”的景象。清军

《马关条约》谈判期间，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：“十年前，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谈过改革问题，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？为此我深感遗憾。”日本对中国存在的要害问题，竟然比我们自己看得清楚得多，不能不让今人也汗颜！

在腐朽的封建体制下，生产力不可能突破牢笼。社会要步入近代化，不仅必须采纳西方技术，而且不能脱离整个国家全面的工业化，也不能脱离西方国家中伴随工业化的各种规章制度。当文化自豪感让中国人看不到这些真理时，日本维新变革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。追赶西方列强的三大改革政策——“富国强兵”、“殖产兴业”、“文明开化”齐头并进。日本不但在军事装备、航运、铁路、电信等方面取得了成绩，而且在军制、法制、教育、政治、思想领域也厉行改革、除旧布新。

甲午战争正是对两国30年军事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总检验。清政府没有紧紧地把握好机遇，失败只是早晚的事。

今日反思甲午战争之败，与其简单地指责清政府战时处置不当，不如研究近代中国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如何失落于时代的发展，总结其历史教训，为当前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，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提供历史借鉴。

村童群集，竖起大旗高举灯笼，冒着倾盆大雨高唱军歌；生活贫困的农民将口中省的几个钱捐出来，娼妓纷纷将多年积攒的卖身钱自愿奉献……

战争爆发前，日本迅速筹集军费相当于1亿多两银子。而清政府煞费苦心，仅筹集到1200万两左右。无奈之际，只好先后向英国借款2900万两，才算把战争维持下来。其中差距，既有融资手段的差距，也有思想意识的差距。

历史反复证明：国家的强弱在于经济状况和国防实力，也在于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。积极进取的国家意志和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，是实现经济繁荣和国防强盛的原因而非结果，也是维系一个国家由弱变强、长盛不衰的永久动力。

战争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较量 更考验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